

增长动力转换论

——基于中国需求面的体制视角研究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Growth Motivational Factors for China's Economy
—From the Demand Side and the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 常欣/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增长动力转换论

——基于中国需求面的体制视角研究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Growth Motivational Factors for China's Economy
—From the Demand Side and the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 常欣/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增长动力转换论：基于中国需求面的体制视角研究 /
常欣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 12
ISBN 978 - 7 - 5141 - 5311 - 8

I. ①增… II. ①常… III. ①中国经济 - 经济增长 -
研究 IV. 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92107 号

责任编辑：刘 莎
责任校对：王肖楠
责任印制：邱 天

增长动力转换论

——基于中国需求面的体制视角研究

常 欣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总编部电话：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010 - 88191522

网址：www. esp. com. cn

电子邮件：esp@ esp. com. cn

天猫网店：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http://jjkxcbs. tmall. com

北京万友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 × 1000 16 开 18.75 印张 300000 字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5311 - 8 定价：49.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 881915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88191586)

电子邮箱：dbts@ esp. com. cn)

目 录

导言	1
----------	---

上篇 高投资的形成、风险与治理对策

第1章 政绩观偏差下地方政府的建设型特征与投资冲动	11
1.1 地方政府的增长偏好与“公司主义”行为	11
1.2 地方建设型政府特征的多重视角考察	16
第2章 财税体制偏差下地方政府的扩张偏向与投资冲动	20
2.1 间接税比重过高，导致地方普遍重视生产规模的扩大和 投资规模的扩张	20
2.2 不动产收入激励过度，强力推动地方上的城市建设和 房地产开发	21
2.3 自主性财政收入不足，引致地方政府对于财政自给的 强烈需求	25
第3章 投资成本扭曲下的高投资	36
3.1 土地要素价格的扭曲	36
3.2 矿产资源价格的扭曲	38
3.3 金融资源价格的扭曲与银行部门的放贷冲动	40

第4章 高投资的风险分析（Ⅰ）：全社会杠杆率上升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增大	46
4.1 全社会杠杆率上升	46
4.2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分析：2012年前的情况	57
4.3 2012年以来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新情况及对地方政府债务最新审计结果的评估	74
第5章 高投资的风险分析（Ⅱ）：过度投资、产能过剩与银行业风险	83
5.1 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	83
5.2 不良贷款反弹与银行业风险	86
第6章 高投资的治理对策	91
6.1 厘清政府的行为边界，矫正地方政府投资行为	91
6.2 改革投融资体制，培育真正市场化的投资主体	105
6.3 加快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矫正扭曲的投资成本	110
 中篇 出口加工大国：矛盾、风险、挑战与应对	
第7章 中国出口加工大国的形成	117
7.1 中国出口加工大国的现状	117
7.2 全球产业分工背景下的加工大国	120
7.3 特殊要素禀赋驱动下的加工大国	121
第8章 中国出口加工大国面临的矛盾	125
8.1 结构性扭曲的矛盾	125
8.2 政策性和体制性扭曲的矛盾	130

第 9 章 中国外部失衡面临的风险	134
9.1 提高货币政策操作难度	136
9.2 增加央行资产负债表风险	139
9.3 引发国际投机套利行为	141
9.4 加大外汇储备经营管理挑战	146
第 10 章 中国出口加工大国面临的挑战	149
10.1 要素供给格局改变的挑战	149
10.2 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的挑战	155
10.3 外部经济环境不确定性的挑战	159
第 11 章 外部失衡的应对之策	174
11.1 推进外汇储备资产币种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多元化	174
11.2 推进外汇资产持有主体的多元化	179
11.3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187

下篇 扩大消费需求的机制与路径分析

第 12 章 理顺收入分配体制，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201
12.1 确保居民应得的要素收益	204
12.2 加大国民收入再分配向居民部门倾斜的力度	219
12.3 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223
12.4 在企业组织结构优化中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228
第 13 章 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减少居民预防性储蓄	234
13.1 增加政府社会性支出带动私人消费	234
13.2 改善政府社会性服务职能	240
13.3 探索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	243

第 14 章 释放农民工群体的消费能量	250
14.1 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250
14.2 抑制不合理的房价上涨	256
第 15 章 挖掘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	262
15.1 发展农民经济自治组织	265
15.2 完善农村基础设施	268
主要参考文献	278
后记	291

导 言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各种结构性失衡进一步突出，特别是需求层面的增长动力结构失衡问题，即投资与出口比重过高、消费比重过低的问题，成为威胁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

需求侧的增长动力结构失衡，实际上反映出经济中的双重失衡：一方面是内部失衡，主要表现为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失调；另一方面是外部失衡，也就是国际收支不平衡，突出表现为贸易顺差过大，而其实质是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并进一步表现为储蓄与消费比例关系失调。因此，综合来看，内外失衡的根本症结在于消费需求的相对不足。

1. 内部失衡中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

进入 21 世纪以来，尽管中国的消费需求在平稳增长，但由于消费的增长远远落后于投资的扩张，导致最终消费率逐年下降，投资率不断上升，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不协调的问题逐渐突出。特别是为了应对 2008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在推出政府刺激计划、扩张公共投资的过程中，投资与消费之间比例关系失调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从最终消费率看，改革开放之后曾长期在 60% ~ 70% 的区间内波动，但进入 21 世纪后呈现明显的逐年下降趋势，从 2000 年的 62.3% 持续下降到 2010 年的 48.2%，降低了 14.1 个百分点，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2011 ~ 2013 年虽有所回升至 49.1%、49.5% 和 49.8%（见图

0-1), 但与国际比较, 中国的最终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要低 30 个百分点。而同样为东亚国家的日本和韩国, 历史上消费率最低的时候, 也在 60%~70%。从消费需求的组成看, 最终消费率偏低主要表现为居民消费率过低, 从 2000 年的 46.4% 持续下降到 2010 年的 34.9%, 下降了 11.5 个百分点。2011~2013 年虽有所回升, 但也分别只有 35.7%、36% 和 36.2%。而美国的这一比例接近 70%, 多数欧洲国家为 55%~65%, 多数发展中国家则为 65%~70%。即使是其他奉行节俭的亚洲国家, 也在 50%~60% (见表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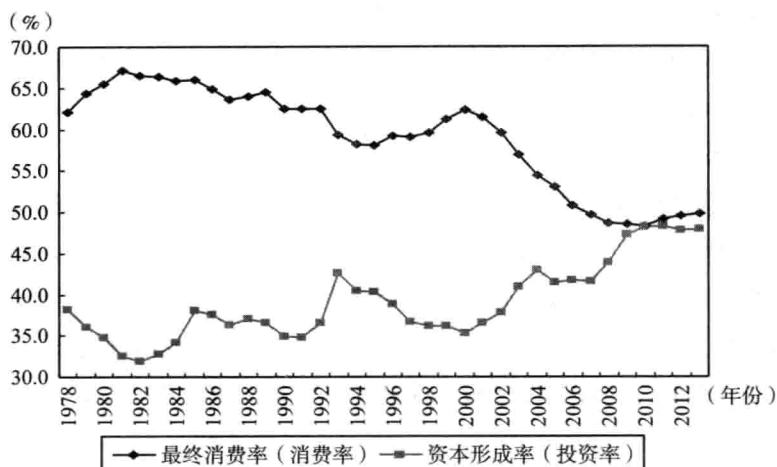


图 0-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投资率和消费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4》。

表 0-1 消费率与投资率的国际比较 (2012) 单位: %

区域	消费率	其中: 居民消费率	投资率
中国	48.4	34.6	48.8
巴西	83.8	62.3	17.6
德国	76.8	57.5	17.3
法国	82.4	57.7	19.8
英国	87.4	65.6	14.8
印度	72	60.3	34.7
日本	81.4	60.9	20.6
韩国	69.4	53.5	27.6

续表

区域	消费率	其中：居民消费率	投资率
俄罗斯	66.7	48.1	26
美国	84.3	68.6	19
高收入国家	n. a.	61.4	19.6
中等收入国家	n. a.	54.9	31.7
低收入国家	n. a.	77.5	27.8
世界平均水平	n. a.	60.4	21.7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DI）。

与最终消费率的总体下降趋势相对应，投资率（资本形成率）总体上呈现上升态势，由2000年的35.3%上升到2011年的48.3%，提高了13个百分点，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由图0-1可以看出，投资率从2003年开始超过40%的水平，高于40%的投资率已经持续长达11年之久。特别是2009年大规模扩张投资计划使投资率从2008年的43.8%大幅提高到2009年的47.2%，之后又进一步提高到2010年的48.1%和2011年的48.3%，2012年和2013年也保持在47.7%和47.8%的较高水平，从而使投资率连续5年维持在47%~49%的高位。与国际相比较，中国的投资率比世界平均水平要高一倍以上（见表0-1）^①。从经济发展历史上看，高投资率主要发生在东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工业

^① 当然，考虑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统计方法的差异，无论是对消费率还是对投资率进行国际比较，都需要小心对待。比如，消费率可能被低估的问题。目前GDP中的消费包括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两个方面。实物消费以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实物部分为基础，在统计时一般采用联网直报的方式（特别是限额以上部分），因此数据真实性较高。而服务消费核算中估算的成分较大，因此存在低估的可能。特别是服务消费中的居住消费被低估的可能性较大。一般来说，居民住房服务消费包括租房和自有住房两种形式。租房服务消费是房屋承租者消费的由出租者提供的住房服务，按承租者支付的租金计算。自有住房服务消费指自有住房者消费了自己提供的住房服务，按虚拟租金计算。理论上，自有住房的虚拟租金应该等于住在自有房屋中的居民要在租赁市场上租住类似的房子需要支付的租金，即应使用市场租金法，国际上不少国家就采用了这种方法。但中国实践中自有住房服务消费是按成本法计算，即按建筑成本乘以一个固定的折旧率（2%~4%）计算。近年来，随着房屋市场价格的较快上升，房屋租金也随之上涨。在这种情况下，用成本法计算的自有住房消费可能会比按市场租金计算的自有住房消费有一定程度的低估。再考虑到中国自有住房的比重较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有住房比例超过80%）的实际，数据失真的可能性确实需要关注。

化大推进阶段大都经历过高投资率，特别是日本和韩国的投资率曾经连续几十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1946～2003年，日本年均投资率为30.7%，1965～1973年日本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年均投资率曾达到36.2%；韩国的投资率比日本略高一些，在经济发展高峰时期曾接近40%。但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投资率连续11年超过40%的情形还是相当罕见的。

正是由于消费率与投资率的上述趋势性变化，中国的投资消费比在2010年接近100%。而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最高峰时为70%，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最高峰时也只有60%。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内部失衡的程度。

如果再从消费和投资各自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见图0-2），2002年以来投资的贡献率一直高于消费的贡献率（2005年除外，该年两者的贡献率大体相当）。特别是公共刺激计划推出后的2009年，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高达87.6%，高出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37.8个百分点。2011～2012年，这一局面有所改观，消费成为大于投资的增长贡献因素，但2012年年底的一轮小规模刺激政策逆转了这个趋势。从2013年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中，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是54.4%，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是50%，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是-4.4%，投资再次成为居于首位的贡献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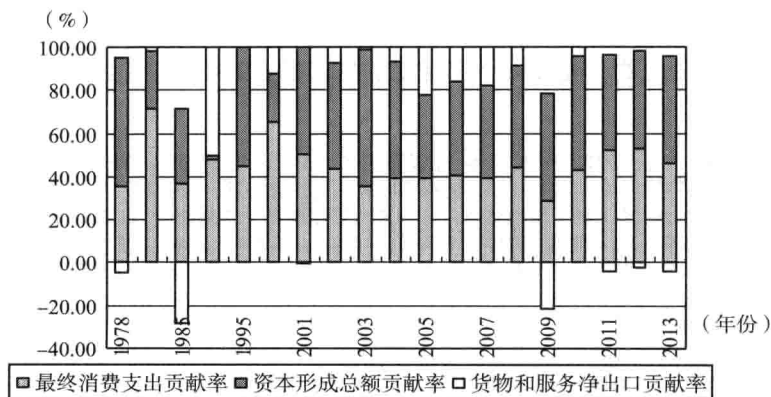


图0-2 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

2. 外部失衡中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集中体现在国际贸易的不平衡,具体表现为贸易盈余的激增。

根据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 $X_t - M_t = S_t - I_t$, 贸易平衡关系即出口 X 与进口 M 之间的差距等价于国内储蓄 S 和投资 I 之间的关系。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的需要,表明国内的经济资源得不到充分的利用,按照平衡关系必然在经常项目上出现相应的贸易顺差,意味着国内储蓄交给别国使用。这可以使一国经济实现无通货紧缩的均衡增长。

近几年,中国经济外部失衡即净出口的大幅增长恰在于储蓄—投资缺口的持续存在。从数据上看,进入 21 世纪以来,尽管中国的投资率很高,但储蓄率更高,并总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表 0-2 反映了 1992 ~ 2012 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和居民、企业和政府三大部门各自的储蓄率^①。从表中可以看出,2007 ~ 2011 年,中国国民储蓄率持续高于 50%,2012 年国内部门总储蓄率也达到了 49.5% (其中,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居民部门的储蓄率分别为 5.8%、18.5%、25.2%),远高于多数国家通常 20% 左右的国民储蓄率 (见图 0-3),也高于以“高储蓄”著称的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的水平,成为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根据国民经济核算原理,储蓄是可支配收入中扣除消费的部分^②。中国储蓄率偏高,意味着储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失调。对于政府部门而

① 中国自 1992 年开始编制资金流量表,迄今已经编制出 1992 ~ 2012 年共 21 张资金流量表。这里利用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来计算国民储蓄率和各部门的储蓄率。在资金流量表中,全部经济部门被划分为非金融企业、金融机构、政府、居民和国外五个部门。可以将非金融企业和金融机构合并为企业部门。居民、企业和政府共同构成了国内部门。国内三部门储蓄的总和即为国民储蓄。国民储蓄与整个国内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之比就是国民储蓄率。将各部门的储蓄与整个国民可支配收入相比,可以得出该部门的储蓄率。三大部门的储蓄率相加,即为国民储蓄率,即:国民储蓄率 = 居民储蓄率 + 企业储蓄率 + 政府储蓄率。

② 对于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而言,在其可支配收入中扣除了最终消费,便是它们的储蓄。至于企业部门,由于不存在消费问题,可支配收入就是其储蓄。

言，说明财政的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不足；而对于居民部门来说，说明有限收入用于储蓄，以支付生命周期中跨期消费的部分过多，导致即期消费需求受到抑制。

表 0-2 国民储蓄率与部门储蓄率 (1992 ~ 2012 年) 单位: %

年份	国民储蓄率	居民储蓄率	企业储蓄率	政府储蓄率
1992	40.29	21.08	13.33	5.89
1993	41.72	19.32	16.15	6.24
1994	42.73	21.49	16.02	5.22
1995	41.62	20.04	16.7	4.88
1996	40.32	21.32	13.57	5.43
1997	40.76	20.75	14.73	5.65
1998	39.98	20.39	14.33	5.27
1999	38.61	18.55	14.31	5.75
2000	37.6	21	17.9	-1.4
2001	38.5	20.6	18.9	-1.1
2002	40.2	20.3	19.3	0.6
2003	43.1	21.7	19.9	1.4
2004	45.7	20.6	22.5	2.6
2005	46.5	21.5	21.6	3.3
2006	48.2	22.4	21.5	4.2
2007	50.9	23.1	22.1	5.7
2008	51.9	23.3	22.7	5.9
2009	50.6	24.4	21.2	4.9
2010	51.8	25.4	21.2	5.2
2011	50.6	24.8	20	5.8
2012	49.5	25.2	18.5	5.8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得到。其中，2000 年以来的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2》、《中国统计年鉴 2013》和《中国统计年鉴 2014》的最新更新数据计算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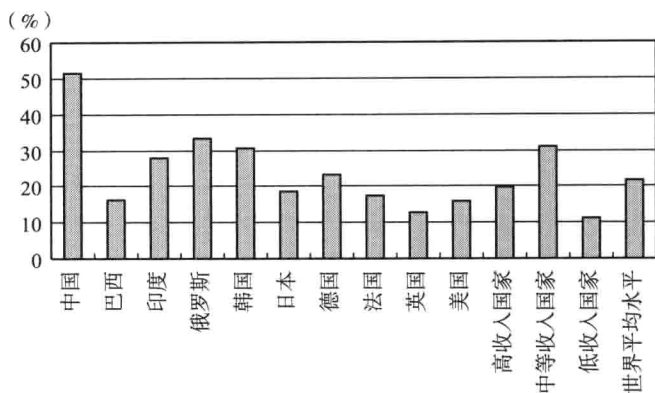


图 0-3 国民储蓄率的国际比较 (2012)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WDI)。

基于上述投资、消费、出口三大增长动力不匹配问题的严峻挑战，本书将集中探讨传统增长动力结构的形成根源，特别是体制性根源；剖析其中隐藏的各种风险，尤其是对宏观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在此基础上，本书提出，有关的政策和体制调整，需着眼于矫正失衡的增长动力结构，通过逐步消除不利因素，促进消费需求的进一步快速增长，以构建一种更加平衡和多元化的增长模式，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需要强调的是，在 20 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后，决策层就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战略性任务。之后的十多年中也反复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增长动力结构转换。但客观事实是，这种转变和转换并不尽如人意，进入 21 世纪后有些结构性偏差甚至还在加剧，各种增长动力结构性失衡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经济的“痼疾”。为什么在摆脱传统的增长方式和增长动力结构方面进展不理想？笔者认为，它折射出的是深刻的体制性问题，反映出在经济机体内部与传统方式和结构相配套的经济体制仍在“惯性运作”，并由此形成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改革力度”的明显落差。为此，本书着重从深层制度的视角对增长动力结构转换的机制和路径进行分析，重点回答深层制度性因素的调整，以及将如何导入更加平衡和可持续的增长动力结构等问题。

高投资的形成、风险与 治理对策

客观地分析，近年来中国投资高速增长局面的形成，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的一面。概括起来，主要是“四化”的因素支撑和拉动了高投资，即工业化、城市化、协调化和市场化。

(1) 工业化与高投资。工业化进程的稳步推进，特别是重化工业化趋势明显，使得社会生产的迂回化程度提高，生产链条加长，资本密集度提高，必然导致投资高速增长。此外，在新型工业化战略下，无论是推进自主创新、发展先进制造业、振兴装备工业，还是推广循环经济，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都需要大量的投资做支撑，由此也必然引致相应的投资规模的提升。

(2) 城市化与高投资。城市化进程的提速，需要在供电、供水、供气、供热、污水和垃圾处理以及城市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领域继续进行大规模投资，并推动了相关产业链中各个环节的投资。

(3) 协调化与高投资。在协调发展战略的引领下，无论是城乡协调发展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还是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各具特色的区域战略选择，抑或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所有这些战略重点的实施都要靠不断加大投资来实现。

(4) 市场化与高投资。市场化改革对投资的促进是多方面的：首先，改革使得投资的体制性障碍有所消除，投资的主体趋于多元化，大量非国有投资主体的投资热情被充分激发出来；同时，改革促进了金融

深化,提高了资金动员能力,便利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发挥,供给面活力不断增强,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部门的生产能力快速增长,使得影响投资增长的某些瓶颈约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为投资保持快速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在看到高投资合理性和必然性一面的同时,也要看到,高投资中也存在非理性和扭曲的成分。高投资中的扭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投资主体的扭曲;二是投资成本的扭曲。从投资主体的扭曲看,在目前的投资体制下,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仍然占据着投资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依然强烈^①。在地方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情况下,由于普遍存在着投资约束软化,投资风险和进入成本不需要个人承担,在一定程度上不合理地拉高了投资的增长速度。进一步分析,地方投资冲动有着深刻的体制根源:一是政绩观的偏差;二是财税体制的偏差。而从投资成本的扭曲看,由于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政府对要素配置和价格形成直接干预依然过多,价格不能真实反映要素的稀缺性和供求关系以及环境损害程度,扭曲了相应的投资成本。这突出地反映在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和金融资源上。本篇接下来将重点围绕投资主体扭曲和投资成本扭曲背后的体制性因素展开论述。同时,对高投资隐藏的风险以及针对高投资的治理对策做一分析。

^① 除了地方政府,企业部门的投资冲动同样不容忽视,这方面首推国有企业。早在1980年,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就深刻地指出,预算软约束是导致企业过度投资乃至宏观经济过热的根源。从仍然大量存在的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看,客观而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从“两权分离”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再到“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有所改善,但国有股“一股独大”甚至是“一股独占”的现象还比较严重,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特别是投资风险约束机制尚未最终确立,“投资饥渴”的特征依然存在。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强化了对于企业业绩的考核机制。但现有的业绩考核体系主要以财务指标为主,而财务指标又以收入、资产、利润总额等绝对量指标为主,容易造成企业为了规模而规模,盲目扩大数量而忽视质量。

至于非国有企业,虽然具有硬的预算约束,但围绕招商引资展开的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使得地方政府和其辖区内企业形成利益上的共生关系。地方政府通过压低土地价格、变相税收减免、以政府信誉担保方式利用银行信贷等种种“父爱主义”的方法,诱使企业投资,也使其投资行为发生扭曲。